

朱迪光◎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船山思想与



B249.25

2018 |

船山思想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朱迪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船山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朱迪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0
ISBN 978 - 7 - 5161 - 9551 - 2
I. ①船… II. ①朱… III. ①王夫之(1619—1692)—
哲学思想—思想评论②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论—研究—
中国 IV. ①B249. 25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687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刘娟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王船山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自《船山遗书》为曾国藩兄弟刻印以来，船山学渐成显学，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甚巨。然而对其思想影响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研究不多，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期盼这样的成果。湖南省船山学研究基地的同人一同深入探讨，撰写了此著，希望能为研究和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该著作首先勾勒了近代以来学界体认的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各种观点，揭示了基于不同的立场对王夫之哲学思想提出的不同看法，反映出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关切与价值标准，从而显示出王夫之价值观念的影响。其次，具体探讨了王夫之春秋大义价值观、人格方面的价值观、“民本”价值观及其影响。再次，研究了王夫之价值观与中国近代价值观念的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的影响。最后，将船山价值观研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应用到青少年的培养。章节撰写情况如下：朱迪光撰写第一章“王夫之哲学体系研究及其价值观念的演变”、第二章“王船山春秋大义价值观”、第三章“亡国之痛与士人价值观念重建——王夫之《俟解》注释与导



读”、第四章“王夫之‘民主’‘科学’价值观之发现与确定——兼论谭嗣同、梁启超民元之前王船山研究之意义”、第五章“‘民本’思想、‘群众路线’与价值观”、第十五章“船山价值观在小学传承的案例——衡阳市船山实验小学文化理念策划”；李相勋〔韩国〕撰写第六章“尚义之道——王船山尚义思想展开的四个逻辑层次”、第十三章“王夫之之礼与政治和合相契何以可能”；彭巧燕撰写第七章“从《诗广传》看船山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伍光辉撰写第八章“王夫之理想人格论及其当代启示”；唐红卫、阳海燕撰写第九章“王夫之的家庭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第十章“王夫之的友情观及其当代价值”；肖剑平撰写第十一章“王夫之的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陈杨撰写第十二章“王船山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杨旭明撰写第十四章“王夫之的廉政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唐红卫、杨旭明还承担了全书的编辑工作。

目 录

第一章 王夫之哲学体系研究及其价值观念的演变	1
第二章 王船山春秋大义价值观	22
第三章 亡国之痛与士人价值观念重建 ——王夫之《俟解》注释与导读	40
第四章 王夫之“民主”“科学”价值观之发现与确定 ——兼论谭嗣同、梁启超民元之前王船山研究之意义	81
第五章 “民本”思想、“群众路线”与价值观	99
第六章 尚义之道 ——王船山尚义思想展开的四个逻辑层次	114
第七章 从《诗广传》看船山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33
第八章 王夫之理想人格论及其当代启示	151
第九章 王夫之的家庭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163
第十章 王夫之的友情观及其当代价值	178



第十一章 王夫之的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	192
第十二章 王船山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205
第十三章 王夫之之礼与政治和合相契何以可能	218
第十四章 王夫之的廉政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240
第十五章 船山价值观在小学传承的案例 ——衡阳市船山实验小学文化理念策划	253

第一章 王夫之哲学体系研究及其 价值观念的演变

王夫之哲学体系到底是怎样的呢？不同的时期，不同学派有着不同的观点，甚至还引起了学术争论。

一

晚清，《船山遗书》问世后，王夫之影响日益增大，同时关于王夫之思想的不同看法开始呈现。此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以唐鉴、曾国藩为代表，认为王夫之哲学是理学。在此一时期还有人认为王夫之哲学是理学，但不同于唐鉴、曾国藩将其归为程朱一系，而有的认为王夫之属于张载一系。

唐鉴（1778—1861），字镜海，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嘉庆十二年举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由检讨历官江宁布政使，内召太常寺卿。后致仕南归，主讲钟山书院。卒谥确慎。清道光、咸丰年间有所谓理学复振，唐鉴其功甚大：“鉴学宗濂洛，坚苦自持，在京师与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等讲明正学，精思力



践，斯须必主于敬，服官三十余年而无儋石，泊如也。”^① 唐鉴为王船山学术思想的传播做了两件事。一是他为王刻《船山遗书》作序，是为《王而农先生全集叙》，文云：

吾乡王而农先生，生不逢时，不能行其道，以胜国之孤贞，伏处岩穴，著述四十余年。其书亦未尝行于天下，而天下之人知之重之。……而先生不屈于外，不挫于内，探天人之精蕴，契性道之流行，知其所以然，行其所当然，而言其所同然。举凡所遇之艰，所履之险，所守之穷，皆若固然而无足怪者。倘所谓不怨不尤，非耶？先生与顾先生不相识，而其志其道则若相同。顾先生明经济之实用，先生发义理之真传，皆不得于时而欲传之后世者也，书顾不重乎哉？先生著书三百余卷，余所见者《易内外传》《张子正蒙注》而已。而其性之冲和，理之纯粹，流露于楮墨间者，令不能置也。书欤？即所以为人欤？《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其先生之谓乎！^②

在此文中特别赞扬了王船山先生的人品，对其学术思想只谓：“发义理之真传。”二是将王船山先生收到他的理学专著《国朝学案小识》之中。在此书中，他将船山归为程朱正学。这应该在当时是最高的褒扬。唐鉴说：

先生学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行丧兴亡之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先生之道可

① （清）李翰章等：《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六，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3299页。

② （清）唐鉴：《王而农先生全集叙》，《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07—408页。



以垂乎百世矣！其为学也，由关而洛而闽，力砥殊途，归宿正轨。^①

且不论唐鉴对王船山的评价是否准确，但这种肯定船山思想是理学正统思想既奠定了王夫之思想的官方地位同时也使王夫之的价值观融进了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

曾国藩对王夫之思想的认识在《船山遗书序》中是表述得最全面完整的，他说：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外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②

曾国藩从三个层次来评价王夫之及其学术思想，一是学问，如云：“先生歿后……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二是人品，不求闻达，深隐，“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前两点与前一个时期的“高风文学”的评价是相同的。三是指出王夫之能继承孔、孟、宋儒之统穷究“仁”“礼”，因而在日记中也重点对《正蒙注》《礼记章句》等进行明确的评论。他在《日记》中说：

二更……四点入内室，阅王而农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

^① （清）唐鉴：《国朝学案小识》，《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44页。

^② （清）曾国藩：《船山遗书序》，《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18页。



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①

.....

余以《礼记章句》为先生说经之最精者，拟细看一遍，以便作序，因以考校对者之有无错误。^②

.....

余因先生说《礼》多通于性命之原，故急取《中庸》阅之。^③

他在致潘黻庭的信中也说：“来示称王船山先生之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儒为堂奥，诚表微之定论。观其生平旨趣，专宗洛、闽，而其考《礼》疏《诗》，辨别名物，乃适与汉学诸大家若合符契。特其自晦过深，名望稍逊顾、黄诸儒耳。”^④曾国藩欲调和汉宋，实际上是尊宋，所以也强调王船山“专宗洛、闽”，深悟“尽性知命之旨”，其功用在“弥世乱”。既揭示了船山思想的理论深度，又将王夫之的思想与提倡道德重修养的需要相结合。

此时期另一种观点是以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认为王夫之的哲学不是理学而是反理学。

梁启超在晚清撰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这部著作里他论述了王船山思想。梁启超在文中既云：“痛叹于黄族文弱之病，其伤心于见”；“抑《黄书》亦《明夷待访》之亚也，其主张国民平等之势力，以裁抑专制，三致意焉”；又明言曾抄录《读通鉴论》

① （清）曾国藩：《（清）曾国藩日记》，《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62页。

② 同上书，第564页。

③ 同上书，第565页。

④ （清）曾国藩：《致潘黻庭》，《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60页。



《宋论》《黄书》中发民权之理者凡三四十条，而梁启超成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德育鉴》之《立志》《存养》篇均抄录有王船山的著述。其抄录的目的，正如梁启超自言：“有志之士，欲从事修养以成伟大之人格者，日置座右，可以当一良友。”是从事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需要的。所谓从“时势”，实际上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研究王船山，将王氏归类为“新旧学派过渡者”。梁启超还以西方的科学实验为标准评价王船山。梁启超说：“此其三，曰以科学实验为凭借相同也。亭林、梨洲、船山之著作等身，若地理，若历史，若音韵，若律历，皆有其所创见，夫人而知矣。”^①

谭嗣同是清末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注重王夫之的学以致用，要“变法”，要明“救败”之道。谭嗣同将船山学术思想比附西学，显然他不会认为船山哲学是理学。他说：

宋儒以善谈名理，称为道学，或曰理学。理之与道，虚悬无薄，由是辄易为世诟病。王船山先生乃改称精义之学，然不若六朝人目清谈元旨为义学也。义学乎！义学乎！其斯为学者正名之宏轨乎？^②

二

在民国时期，关于王夫之哲学思想的争论并未停息甚至还愈演愈烈。不仅出现了理学与非理学的争论，甚至还出现了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争论。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1页。

^②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页。



钟泰、蒋维乔等学者认为王夫之哲学是理学。钟泰（1888—1979），字讱斋，号钟山，江宁人。师从太谷学派中期宗师黄葆年，曾攻读于江南格致书院，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先后担任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等职。著作中王船山学术研究术语有：经制、理气、儒释之辨、为学、修齐治平、清虚一大、二气之良能、幽明、有无、心、性、关学、动静、命、习、思、意、知耻、先难、象数之学等。全是传统命题，也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制”，钟泰说，《噩梦》《黄书》，多言经制，盖《日知录》《明夷待访录》之流。^①“动静”“有无”，钟泰说，船山之说可述者，言动静，则主有动无静。言有无，则主有有而无无。^②“性”“心”，钟泰说，言性，则推之命而别于习。言心，则合之思而别于意。^③“下学功夫”，钟泰说，论下学功夫，一在知耻，一在先难。^④他在《凡例》中说：“中西学术，各有统系，强为比附，转失本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⑤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日本，民国元年参加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筹备组工作，民国十三年任东南大学校长。蒋维乔著《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分为两编：《复演古来学术之时期》《吸收外来思想之时期》。第一编分为八章，第一章“程朱学派”、第二章“陆王学派”、第三章“朱王折衷派”、第四章“关洛闽学派”、第五章“考证学派”、第六章“实用派”、第七章“和会儒释派”、第八章“公羊学派”。其中第四章“关洛闽学派”专述王船

① 参见钟泰《中国哲学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333页。

② 同上书，第333页。

③ 同上书，第334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1页。



山一人。蒋维乔首先就明确指出：“夫之之学，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规。”然后引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为证。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云：“张子之学，上承孔孟，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惜其门人未有殆庶者，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之数学，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蒋维乔称：“于此可见夫之实崇拜张子之关学，而有意继承之者。”^① 并赞成唐鉴《国朝学案小识》称夫之由关而洛而闽的说法。最后云：

夫之自己之学说，多见于《思问录内外篇》《俟解》二书。其言性，则曰：“尽性以至于命，至于命而后知性之善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何善如之哉！测性于一区，拟性于一时，所言者皆非性也，恶知善。”盖谓性是普遍的，不可于一方面测之，不可于一时间拟之，必推极至于命，而后可知性之全体也。其言心，则曰：“天下何思何虑，言天下不可得而逆亿也；故曰：无思，本也；物本然也。义者，心之制，思则得之；故曰：思通用也，通吾心之用也。死生者，亦外也，无所庸其思虑者也。顺事没宁，内也；思则得之者也。不于外而用其逆亿，则患其思之不至耳；岂禁思哉！”

钱穆先生虽然没有明确说船山学是理学，但却认为船山学源于宋学。钱穆认为“宋学”要追溯于唐韩昌黎，说：“昌黎论学虽疏，然其排释老而返之儒，昌言师道，确立道统，则宋儒之滥觞也。”^② 并说：“所谓‘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

^① 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973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



也。”^① 最后归纳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则创通，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② “宋学”与王船山学术又有何关系呢？钱穆说：“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③ 钱穆重宋，虽有崇宋的意味在其中，但也有辟辨学术源流之蹊径举措在其中。钱穆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④

同样认为王夫之思想是理学的还有王孝鱼、张希堂。他们一方面将船山思想当作理学；另一方面将船山思想当作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提出船山哲学不是唯物论。

王孝鱼，字永祥，山西榆次人。1934 年著《船山学谱》，在《自记》中，记叙了其家庭对船山思想的认同、追随以及对船山人格的仰慕。求学时，其父亲督促、勉励他学王船山著作，培养了他平生致力于船山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和能力。民国时期，王永祥除著有《船山学谱》外，还撰写了《王船山的历史进化论》^⑤ 等学术论文研究船山思想。王永祥《船山学谱》中的王船山哲学研究范畴是中西结合、以中为主。王永祥在构拟王船山哲学体系时亦是如此，其体系由根本观念、气化论、心性论、修养论、知识论、历史进化论六部分组成。王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 页。

② 同上书，第 7 页。

③ 同上书，第 1 页。

④ 同上。

⑤ 王孝鱼：《王船山的历史进化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 年第 1 期。



永祥船山哲学研究的目的：“用是发愤，欲将船山思想分析综贯，勒成一书，一以藉新理学书之面目，一以聊表多年景仰之忱，非敢自矜也。”^① 曾有人因王永祥《船山学谱》开卷第一篇是《天下唯器论》，就称其无异于宣布唯物主义乃是王船山哲学的基本立场。这显然是不妥当的。王永祥说：“天下一切皆物，一切皆自天生之自我成之者也。心无非物也，物无非心也。离物无心，离心无物，二者各有而互成。唯心者非，唯物者亦非也。”^② 他明确表示不赞同船山哲学是唯物论，而将其归为理学一类，但其“天下惟器论”“气化论”“人本主义”“历史进化论”等范畴的研究基本上奠定了船山哲学研究主要内容。

张西堂（1901—1960）本名张正，字西堂，大学毕业后以字行。祖籍湖北汉川，生于湖北武昌。早年曾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因病辍学。1919年复考入山西大学国文科。在校期间即开始学术研究，主攻朴学（研究群经诸子之学）。1923年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太原三晋高级中学、新民中学、斌业中学任教。1926年秋到北京，先后任孔教大学、河北大学、中国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1931年8月到1934年7月，经顾颉刚介绍推荐，张西堂赴武昌国立武汉大学和河南大学任教。1934年8月回到北平，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并参加了《中华大辞典》的编纂工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张西堂辗转到广西梧州，任广东襄勤大学教授，后又到贵阳任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并曾一度在四川江津国立编译馆工作。张西堂在船山研究方面先后撰写了《船山思想之体系》《王船山的经世思想》等论文，其船山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王船山学谱》。《王船山学谱》据张西堂自序，因在北平执教课程中有清代思想一门，船山思想又所夙好，故撰此书，成

^① 王永祥：《王船山学谱》，《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978页。

^② 王永祥：《王船山学谱》卷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于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南迁长沙后出版。

关于王船山思想的主要内容，他概括道：“船山深恶陆王之学，窃佛老虚无之旨，贻害于天下国家，乃倡实有生动之论，以破虚无寂静之旨。其言曰：‘尽天地只是个诚’，而其所谓诚者则‘实有’也。宇宙之起源，本为实有；宇宙之本体，亦为实有。物生于有，不生于无。而太虚本动，至诚无息，天地之德，生生不已，惊天动地是更发为天地之化日新，物质不灭，诸说。实有生动之论立，则虚无寂静之旨自破。此其立言已有过于黄、顾诸儒而无不及矣。”^①

关于王船山的哲学，张西堂先从总的方面说，王船山生当明末清初之际，深感王学末流之弊，窃佛老之旨，游心于虚无，而引起亡国之祸，故提倡实有生动之说，以破虚无寂静之谬论。实有观念，在王船山思想中，实占极重要之位置，因实有而主张生动，乃有天地日新、物质不灭诸说。又根据西洋哲学与中国传统理学的内容分为四个研究领域：宇宙论、心性论、修为论、知识论。由此可见，张氏船山哲学研究既非传统理学的研究，亦非纯套用西方哲学体系。关于宇宙论，张西堂认为王船山对宇宙的起源的认识是“太虚一实、物生于有”。王船山对宇宙本体的认识是“理气一元、道器相须、心物一元”，“诚与道异名同实”。王船山认为天地日新，将实有与日新相联，因而物质不灭、自然永久、盈虚终始。王船山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亦有其特别之处，以人为本，人为天地之心，人又为天之绪，天命不可违，要求天人合于一理。王船山对体用与动静的认识，张西堂认为船山提倡体用合一，但于体重用，由用以见体，主张动静合一、理势合一。关于心性论，张西堂指出：“先生之心性论，以形色论天性，而谓性命日生，亦合于实有生动之说，至于性情一元、理欲一

^① 张西堂：《王船山学谱·自序》，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